

## □ 人物剪影

省吃俭用，靠给别人修理家电挣饭钱，也为孩子减轻点负担。为了给老伴解决缝补困难，傅英豪为唐旦发明了一种手动缝纫机，像订书机似的。有一阵子，北京的农贸市场经常有老乡在摆地摊卖这种手动缝纫机。人们不会知道，这种机器的发明人，是出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线电专家、“雷达兵之父”傅英豪之手！

空军给他们的审查结论主要有三条，第一，曾介绍了叶群这个假党员；第二，曾向当时的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汇报过工作，并给林立果看过雷达部署图；第三，曾吹捧过林彪。

傅英豪曾申述过，1983年经空军重新复议，他被开除党籍，从行政9级降为13级；唐旦恢复党籍，由10级降为12级，两人都交地方安排。这样的戴罪之身和这把年

纪，地方怎敢接收？后来傅英豪曾通过老关系想入职清华大学和社科院，空军又不同意。最后到死，老两口都挤在孩子家里。

老两口的一些作为至今让子女们百思不解。傅英豪出狱后抱着女儿傅胜利痛哭道：“党不要我了！”唐旦生活最艰难的那些日子里，还要把省下的钱交党费。

1994年9月23日，傅英豪突发心脏病，因救治不及时去世，时年78岁。女儿说，父亲平时很注意锻炼，常年坚持游泳，身体一直不错，如父亲有起码的医疗条件，是不会死的。女儿还说，父亲去世时，眼睛始终睁着，怎么抹都不闭上。几年后，母亲也随父亲去了，父母生前没有给我们留下一分钱、一片瓦。

（原载《老照片》第97期，  
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年10月）

# 传奇文史大家卫聚贤

○散 木

卫聚贤(1899—1989)，字怀彬，号介山，又号卫大法师，山西万泉人。

卫聚贤是民国著名学者，其一生极富传奇色彩，亦堪为其时学界之一怪。他拔起于逆境，以自学出身，终有志者事竟成，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，得王国维等亲炙，后以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鸣世，著述颇丰，且是学界中的组织者，但以其所论多怪异，研究方法又不同常人，加上他后来离开大陆，于是更为人所罕知。今天，已经没有人知道他了，于是他几乎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学界的一块“化石”了。

##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怪才

卫聚贤太原读书时原本亦热心于社会活动，后以参加学生会活动失意，转而钻研古史，又索性中止学业赴北京投考师大历史研究所，却因该所从不招收外校学生而罢，他遂在师大旁听，兼在私立新闻大学就读。1926年，他又投考其时中国第一流之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，而此时卫聚贤并无一张正式文凭可以出示。考试时，史学泰斗王国维先生观其作文题目为“春秋战国时代之经济”，问其做该题取何材料？答以《国语》、《左传》；



卫聚贤先生

又问对此两书之成书时代有何疑问，卫不能答，其后其乃悉心于两书的研究。

卫聚贤考取后，益发奋刻苦攻读，黽勉向学，其又以自幼持操算盘，精于统计，遂惯于运用“历史统计法”而别开蹊径。清华一些同学原来就小觑这一无文凭的山西人又“土得掉渣”的同窗，常嘲讽他用统计方法研究历史，相与调侃道“研究院来了个商人”。至卫聚贤《左传研究》书成，梁启超对之赞叹不止，众人乃服之，方对之刮目相看。其时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有《左传真伪考》寄赵元任，赵转给李济，卫见后甚“垂涎”，又苦于外语程度不高，于是邀同窗陆侃如与之合译之，继请赵元任校正，胡适也为之作了长序。

清华国学研究院从1925年至1928年共有四届，卫考取的是第二届。卫聚贤在清华受教于梁启超、陈寅恪、王国维、赵元任、李济“五大导师”，尤其受梁启超、王国维教诲独深。卫专修中国上古史，研究课题是《左传》，导师是王国维，此外李济先生的建构中国考古学对其构成了直接影响，其时国学研究院山西弟子仅卫氏

与史念海二人而已，学友则刘节、徐中舒、谢国桢、王力、姜亮夫、高亨、蒋天枢、刘盼遂、陆侃如、吴其昌、罗根泽、姚名达、周传儒等。

研究院有《国学论丛》季刊，由梁启超主编，为国际著名刊物，多收研究院导师和毕业学生论文，其中卫的论文《〈左传〉之研究》亦曾得国际汉学人士关注，并给予好评；《清华周刊》也刊有他的《晋文公生年考》等。卫还与同学成立有“述学社”，这个团体是为反对国学研究中“顽固的信古态度”和“浅薄的媚古态度”而成立的，它宣称“宁可冒着‘离经叛道’的罪名却不敢随随便便的信古；宁可拆下‘学贯中西’的招牌却不愿随随便便的媚古”，这是他们在整理国故和西学东渐浪头上一种健全的姿态。“述学社”出版《国学月报》，先后刊有卫的《晋惠公卒年考》《万泉卫氏考》《春秋的研究》《释家补正》《〈金滕〉辨伪》等论文，在该刊的“社员著述一览”中标有卫的《春秋地图》和《一得录》，而“社员著述出版预告”则有他毕业论文的《左传研究》，那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，《春秋的研究》是由“朴社”出版的，加上其前写成的《国语的研究》，这三研究后来又合为《古史研究》，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，此书在中国史学界影响颇显。

### 求学王国维

卫氏是王国维生前最后弟子之一。1927年6月1日，王国维参加卫聚贤等毕业典礼和师生叙别会后，是夜又照常批阅学生试卷，完毕，乃草拟遗书藏之于怀，翌日遂投湖。

王国维之死是中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，

## □ 人物剪影

其原委是北伐军将抵华北，清华园内有小刊物作漫画丑诋“研究系”，讽刺清华研究院由梁启超居长而左右之，梁遂不安，告假返天津，众人亦惶然，有避入东交民巷者，有出国远遁者。继闻湖南农民运动诛杀了大地主也是大学人的叶德辉，园内传单纷至沓来，且谓将剪辫子（卫氏解释王的保留辫子，是为了出入故宫参观考古资料的方便，后来溥仪被逐出故宫，王始终保留了这条辫子）等，更有出示“拟杀之名单”者，王国维忧心忡忡，又无术可避。“老实得像火腿”的王国维竟遍问学生何以为计，询至卫聚贤，彼建议王国维可徙居太原，因山西表里山河，持掌山西的阎锡山又善变，几乎成功地在若干次国内政治纷争中使山西处变不惊，免于动荡，且卫氏正与三二同好在晋祠开办兴贤大学，可聘王先生授课，薪金暂委屈先生月奉百元，每月仅来校上课一次。但王未置可否，只说：“山西无书”，卫答太原文庙有藏书，且太原私家藏书者也不乏其人，王仍未允

可。岂料半日后王国维竟投湖，卫聚贤顿足长叹，只有叩首大哭了。

王国维死北京，其先世之祖王稟于北宋抗金时死于太原保卫战，则王氏一殉于中国文化将既倒，所谓殉道，一殉于朝廷冠冕制度，亦所谓“守道义”，皆“狐死正首丘”之义。后来卫氏在台湾辅仁大学授课，将其所知道的王国维死因书告王国维的公子王东明先生，信中亟称“王先生如果不死，学术上成就会更大，因王先生身体瘦而健康，那年他才51岁，他可以活到八九十岁的”。对友人他又称王之死乃“高人一等”，因为其若尚在，“被留在铁幕中，一样也被清算了”。

## 奠基考古学

卫聚贤清华毕业后，与友人在太原合办私立兴贤大学，其任副学监。后由乡人、冯玉祥连襟薛笃弼介绍赴南京任大学院科员，专事审查历史教科书，继又兼任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长，期间曾参与主持发掘南京新石器文化与明故宫遗址。

中国考古界有江南无新石器文化的定论，卫聚贤发掘栖霞山汉墓时发现红色含砂质粗陶片，他以此为线索，连续野外作业数月，终于发掘收集和整理出石斧、石刀、石锛以及几何花纹陶片数百件，证实江南确存在新石器文化，又发现大明通行宝钞之印钞铜版。经研究后证明“江南于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”。其间，他还在余杭良渚、金山卫戚家墩等处进行考古发掘活动，结论为“古代吴越自有其本位文化”，与现今之考古研究结论相符，其时他撰成并与人合作撰成《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探报告》、《金山卫考古记》、



卫聚贤致友人书信

《奄城考古记》、《南京明故宫发掘报告》、《历代建都南京的货币》等。

其后，卫聚贤因与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不合而辞职。此前，李济先生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文化遗址，揭开国人独立考古发掘之序幕，受此影响，卫聚贤返乡发掘汉汾阴后土祠及万泉新石器文化遗址，部分出土文物曾运往北平展览，事被北平女师大研究院知悉，遂聘其为该院研究员，派其代表该院与山西图书博物馆合作，偕董元忠和美国毕夏波共同发掘山西万泉荆村瓦渣斜新石器遗址，以便能将出土文物运至北平整理后陈列（现仍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）。卫聚贤还兼任了北平女师大图书馆主任，他于馆内参考摩尔根《古代社会》等书，系统研究中国古代社会，撰成《母系时代》、《奴隶社会》等多篇论文。然不久，女师大解约，卫聚贤又有失业之虞，乃南下就上海暨南大学之聘，迨“一·二八事变”后又被迫返乡，任太原国民师范学校教员，兼省政府之“十年建设委员会”委员。

“淞沪停战协定”签字后，卫继往上海任教，1934年离开暨大，相继在中国公学、持志学院、正始中学等执教。后又由友人介绍，在国民党监察院受聘为审计科长兼驻外稽查委员、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专员和协纂。“央行经研处”曾有两位学有专长的山西学人，一为卫氏，一为冀朝鼎。以乡人孔祥熙的眷顾和财力，卫氏乃得以聚集文物而研究之，且不断扩大研究领域。此之前后，卫聚贤已有《中国财政史》、《中国商业史》、《山西票号史》等问世，又于公余研究吴越史地，并与蔡元培、于右任、吴稚晖、叶恭绰等发起组织“吴越史地研究会”，由卫聚贤任总干事主持会务，

是会囊括中国历史、考古学者专家以及诸政要，后研究出版有《吴越史地研究论丛》（后上海文艺出版社给予影印再版）。

为了扩大考古范围、并引起大众重视，卫聚贤（在民国史界中有“智多星”之称号）除在各地讲演宣传之外，还出点子于江浙各县遍设“吴越史地研究会”分会，并将其考古所得之样本分送每县，陈列于县小学和民众教育馆内，令民众看视而得知其为吴越古物，若以后发现有相同者，就可以据此报告给分会或上海总会，以便组织调查和发掘。这样，今世人共知之“良渚文化”等多赖其开辟草莱，其亦为吴越考古之奠基人。其时，他还曾将部分出土文物运至上海展览，影响广泛。他还组织有“说文社”，自费出版《说文月刊》。

## 重大创见

上海沦陷后，卫聚贤随中央银行西迁，其任秘书处秘书。卫氏在后方主持抗战期间唯一的一家考古民间学术团体“说文社”，主持唯一的一家国学刊物《说文月刊》，以社、刊会友，借孔氏资助编刊《巴蜀文化》、《西北文化》等专号，其又慷慨好客，一时“说文社”的“聚贤楼”群贤毕至，乃网罗大后方文化界、文教界名流如郭沫若、周谷城、顾颉刚、马衡、胡小石、常任侠、杨仲子、金静庵、王献唐、傅振伦等，从事学术研究，这在战争年代是难能可贵的。

卫聚贤与郭沫若等曾配合教育部，共同发掘了重庆江北汉墓，继在成都白马寺发掘出青铜兵器等，开拓了巴蜀文化研究的新局面。他还与于右任等赴西北敦煌等处参加考古活动，并任西北联大文学院院长兼教授。时卫聚贤多次呼吁筹备开辟通

## □ 人物剪影

俗博物馆，自己也多方着手收藏、收集有关文物，可惜他于1940年经河内转往重庆时遇敌机轰炸，所携文物俱毁，但他心不死，开始重新收集和收藏文物。抗战结束后，卫聚贤辞去一切职务，专事“说文社”的工作，主编《说文报》，又兼西南美专教授。

1949年重庆解放，为表示对新政府的拥护和支持，卫聚贤将其多年收藏的近千种、近万件古代文物和民俗文物以及尚未整理的古钱、货币、清代和民国文献等，悉数捐赠给西南军政委员会，其余文物及书籍等后来也由其子女捐赠给了西南图书馆。但卫聚贤后终因对新生的政权产生隔阂而离去。1950年，他转赴台湾又寓居香港，其后相继在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、香港联大（联合书院）中文系、珠海书院、光夏书院、远东书院等研究和执教。

1954年（一说1974年），卫聚贤有一惊人之举，即他发起乘木舟横渡太平洋的试验，以图证明“中国人发现美洲”之说（其著有《中国人发现美洲》以及《中国人发现澳洲》、《中国古代与美洲交通考》）。卫聚贤“大胆假设”又“大胆求证”。于是年率人员乘坐依照广州出土汉代船形的复制木舟，经南洋东驶美洲，不料在距彼岸数百里处失事，幸而遇船救助方脱离危险。

1975年卫聚贤退休后赴台，任台湾辅仁大学教授。晚年的卫聚贤渴盼祖国统一，以其谱牒学的功力参加“寻根认祖”的活动，先后为移居台湾数百年的不少大陆籍人士找到祖籍，并著有《台湾山胞由华西迁来》、《台湾山胞与粤闽关系》等。

1989年11月16日，卫聚贤于新竹逝世，享年90岁。

摘自《文史月刊》2004年第2期

## 罗庸其人其学

○陈友康

罗庸（1900—1950），字膺中，号习坎，是杰出的古典文学专家、教育家。他在壮年去世，写成文字的著作不多，除了因作《西南联大校歌》歌词为人所知外，后来学界、公众对他的学术成就的认知度远没有他的实际造诣那么高，郑临川教授说他是“身后寂寞”的学者。

### 显赫的教育背景和资历

1917年，罗庸进入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学习，1920年毕业。1922年，他又进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读研究生，其间著有《尹文子校释》等。他们这批学生是北大第一批研究生，实际上也可以视为中国培养的最早的研究生。

研究生毕业后，罗庸历任中山大学、浙江大学等校教授，并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。1927年初，他到日本东京大学讲学；1932年，他返回北大中文系任教授。抗战爆发后，他随北大南下，任教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及云南大学。在西南联大，他和罗常培并称为“二罗”。1944年11月，他接替罗常培任联大文学院中文系主任、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，直至联大复员。联大时期，他还担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，指导了逯钦立、阴法鲁等研究生。1949年，他应梁漱溟邀请赴重庆，和谢无量、梁漱溟等在勉仁学院讲学；1950年6月病逝于重庆，时年仅51岁。罗庸在儒学、古典文学、